

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学术创意与构想*

梅新林, 俞樟华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浙东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术流派。目前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是编年史研究工作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浙东学派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建立在坚实文献基础之上而编纂一部《浙东学派编年史》,不仅可以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而且可以在一个新的学术起点上推进浙东学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通代与区域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并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关键词:浙东学派;编年史;学术构想

中图分类号: C092 K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0)05-0001-07

浙东学派是一个以浙东区域命名而又超越区域、深刻影响海外与当代的著名学术流派,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就浙东学派内涵而言,大致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东学派一是指以南宋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合之为浙东学派;二是指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以研究经学与史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为便于两者的区分,有的学者分别名之为浙东事功学派与浙东经史学派或浙东史学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则是从南宋浙东事功学派贯通至清代浙东经史学派,通过彼此的学脉传承而合为一体。

基于对当前学界有关浙东学派研究成果的综合评估,我们认为在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两个方面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尤其是编年史研究工作的缺位,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浙东学派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迫切需要尽快启动《浙东学派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的大型研究项目,通过文献整合与学脉梳理双向并进、互动整

合的策略与路径,努力建构富有创意的集成性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并以此推动浙东学派研究的学术创新与超越。

一、《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学术价值

浙东学派研究起于清代,至20-21世纪之交逐步走向兴盛。兹以林存阳的四阶段论^[1]为参照而加以适当充实与调整。第一阶段始于清人“浙学”、“浙东学术”概念的提出,分别以全祖望修订《宋元学案》、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为代表。近现代学者关于“浙东学派”等的讨论,即是围绕全、章二人所提出的概念展开的;第二阶段为20世纪20-30年代。相继出现了张其昀《宋代四明之学风》(1929)、陈训慈《浙东史学管窥》(1930)、《清代浙东之史学》(1931)、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1932)等论著,其中何氏所著《浙东学派溯源》一书,可谓本时段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此后,张寿镛在编纂《四明丛书》的同时,撰写了《宋元浙东学术渊源考》然后以《四明丛书》第五集总序形式刊诸于世,对推动浙东学术

* 收稿日期: 2010-09-05

作者简介:梅新林(1958-),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俞樟华(1956-),男,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世纪末。自 1983 年在宁波召开“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起,至 1995 年在余姚召开“纪念黄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五次学术研讨会皆有论文集出版。在此期间,学术论著与文集整理的成果也更为丰硕。前者除了大量论文之外,重要学术专著有王凤贤、丁国顺合著的《浙东学派研究》,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方祖猷的《清初浙东学派论丛》,周梦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方如金的《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袁尔钜的《箴山学派研究》,徐定宝的《黄宗羲年谱》,钱茂伟的《浙东学术史话》以及收录于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诸多对浙东学派著名学者的评传;后者则以《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宋濂全集》等为代表;第四阶段为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 10 年间,承续 20 世纪末的盛势而又有新的拓展。其中重要学术会议有 2003 年在宁波召开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2005 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文化研讨会”,同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吕祖谦国际研讨会”,2008 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浙东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吕祖谦全集》发布仪式”。同样地,在每次学术会议之后都有论文集出版。学术专著方面,又有钱茂伟的《姚江书院派研究》,董平的《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万斌主编的《浙学研究集萃》,杜海军的《吕祖谦年谱》,俞樟华的《王学编年》,王锷的《北山四先生研究》,以及鄞州区政协文史委编的《越魂史笔——全祖望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图书馆编的《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相继问世。文集整理方面,除了《黄宗羲全集》修订出版之外,最重要的集成性成果是黄灵庚、吴战垒主编的《吕祖谦全集》。2005 年,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以浙东学派研究为重点,不仅积八年之功顺利完成了编纂《吕祖谦全集》的巨大工程,而且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有关浙东学派的后续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

就中国学术总体发展趋势观之,20-21 世纪之交浙东学派研究的兴盛,显然是与同时期由“重写学术史”引发的“学术史热”相呼应的。“重写学术史”,实质上即是对原有学术史的历史还

原与重建,要求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因而特别需要先进的学术史观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双重支撑以及彼此的高度融合。以此衡之,勃兴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在这两个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学术既由“学”与“术”所组成,学者,学说也,学理也,因此学术史研究不仅离不开思想,相反,更需要深刻思想的导引与熔铸;另一方面,学术史研究的进展也取决于扎实的文献基础,其中学术编年显得特别重要。然而在世纪之交“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实践中,学术编年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忽视,甚至尚未进入相关重要话语体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憾。

透过 20-21 世纪之交浙东学派的研究热,大致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而重点展开:一是关于浙东学派的本位思考与讨论,尤其是就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学三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内在关系展开系统辨析;二是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献整理,集中体现在大型学者文集(详上文)与地方丛书编纂(详下文)的成果中;三是浙东学派学术史研究,除了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万斌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钱茂伟的《浙东学术史话》等学术著作之外,还出现了大批论文;四是浙东学派与当代浙江文化精神研究,论文数量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与同时期“学术史热”同样存在缺憾的是对于学术编年的普遍忽略,除了俞樟华的《王学编年》之外,同类著作几乎阙如,更无一部贯而通之、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浙东学派编年史》问世,这就严重制约了浙东学派研究的拓展与突破,也与浙东学派本身源远流长、学者辈出、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学术地位不相称。因此,率先启动《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编纂,首先即有填补学术空缺的意义。与此同时,围绕《编年史》的相关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献整理成果可以为理论探索提供新的发现与启示,而理论探索成果则能更好地指导和促进文献整理的深化和突破,彼此具有为浙东学派编年史夯实文献根基与贡献学术新见的重要价值。此外,鉴于浙东学派在日本和东南亚拥有广泛影响以及对当今社会尤其是长三角区域仍在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编纂,也有助于通过广泛吸纳海外学术成果而促进彼此之

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二、《浙东学派编年史》的文献整合

《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编纂,首先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必须在相关文献的整合与集成上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

(一)《编年史》第一级次的文献整合

以相关文集为最基本的文献依据。主要包括各代总集、地方丛书与个人别集和家集。

1 各代总集。曾枣庄主编的《全宋文》与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都是经过今人系统整理的一代大型总集,从中直接采集相关文献颇为便捷。明清两代总集则可以利用《明文海》、《清文宗》及《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等。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等联合建立的有关《明人文集书目》、《清人文集书目》数据库,收录了包括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香港、台湾等地图书馆收藏的明人文集、清人文集,有助于弥补现有明清两代总集编纂的缺陷。

2 地方丛书。可资利用的有:孙衣言编纂的《永嘉丛书》、胡凤丹编纂的《金华丛书》、胡宗懋编纂的《续金华丛书》、张寿鏞编纂的《四明丛书》及宋世莘编纂的《台州丛书》等。至于新编的地方丛书,已陆续出版的有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纂的《绍兴丛书》、即将出版的有黄灵庚、陶成华主编的《新编金华丛书》正在编纂中的还有《温州丛书》、《义乌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

3 个人别集和家集。除了应参照各代总集、地方丛书所收之外,一是要广泛采访各图书馆及民间收藏的个人别集和家集;二是重点利用经今人整理的个人别集,如《吕祖谦全集》、《宋濂全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等。

(二)《编年史》第二级次的文献整合

重点围绕史志、谱牒、目录、学案四个方面而展开。

1 史志。包括正史与方志。宋元明清四代之正史之作中,《宋史》之“儒林”、“道学”传,《元史》之“儒学”传,《明史》之“儒林”、“文苑”传,《清史稿》之“儒林”传,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

传统正史毕竟重在帝王将相,而于学术普遍缺乏广泛而有深度的记载,对此,方志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浙江方志按不同级次——从省志、府志、县志直至乡镇志——都比较完备。洪焕春《浙江方志考》所录浙江省志 42种,府志和县志 986种,乡镇志 118种。这些方志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等,部分收藏于各级政府的方志办中。对于新时期大量新编的方志,需择要参考之。

2 谱牒。包括年表、年谱与家谱。关于年表,可资参考的有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学术编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俞樟华所著的《王学编年》、陈祖武、朱彤窗所著的《乾嘉学术编年》等;关于年谱,需重点利用前人编纂的各种年谱,主体部分已收录于首部大型断代年谱丛刊《宋人年谱丛刊》以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同时还要广泛查询和充分利用以上二书未收的各种年谱以及今人新编年谱,后者如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徐定宝《黄宗羲年谱》、陈训慈《万斯同年谱》等;关于家谱,除了各图书馆所收藏的之外,目前还有大量家谱散落在民间,需要及时加以收集与整理。由浙江图书馆组织专家学者历时 4 年编纂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规模宏大,收录完备,可以视为中国家谱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浙江家谱 12 000 余种,其中 6 600 种来自省内收藏,居全国第一;其余来自外省及海外收藏。据专家估计,现存浙江省历代编纂印刷的家谱数量占了中国存世家谱总数的三分之一。最近,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教授在主编《新编金华丛书》的过程中,也收集审阅了大量家谱,从中发现了不少珍贵文献。可见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掘的丰富宝藏。

3 目录。包括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家目录以及特种目录等。一般的目录仅有记载图书典籍或指示藏书之所的功能,但一些著有提要的目录,则多承之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同时兼有某种学术史研究之功能,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古代的诸多藏书目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同样,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总目》、《中国家谱总目》,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以及今人所著,如王瑞明《宋人文集概述》、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李灵年、

杨忠《清人别集总目》洪焕春《浙江方志考》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功能,可以为《编年史》提供诸多富有价值的史料和信息。

4 学案。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奠基之作,后继中与浙东学派相关者,有唐鉴所撰的《国朝学案小识》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杨向奎主编的《新编清儒学案》等。学案体通常应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设学案以明“学脉”;二是写案语以示宗旨;三是选精粹以明原著。学案同样鲜明地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在要求,实际上是一种特殊体式的学术史,对《编年史》的编纂尤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编年史》第三级次的文献整合

需要广泛拓展至实录、会要、起居注、档案、类书、笔记等。历代的实录、会要和起居注,主要为《编年史》的编纂提供学术背景方面的资料,而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则保存了部分浙东学者的奏章等原始文献。宋代以来,学人笔记与时俱增,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黄震《黄氏日抄》王应麟《困学纪闻》等,或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或反映作者的学术见解,或反映作者的学术交往,都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比较而言,以清代的学人笔记参考价值最高。

(四)《编年史》第四级次的文献整合

重点在于充分吸纳当代学者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其中为数最多、价值最高的是有关浙东学派整体与个体学者的研究、考证论著,需要编撰相关“论文索引”和“著作提要”。至于其他方面,甚至如辞典、索引等工具书的利用价值也不能忽略。比如通过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辞典》可以检索相关人物的年谱;通过邓广铭主编《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陆峻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民的《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可以检索三代文集的各类专题文献;通过各种传记资料索引,可以检索各代的相关人物史料。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为了更好应对以上四级序列文献整合的繁重任务,特别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及相关检索平台,上述复旦大学图书馆等联合建立的《明人文集书目》《清人文集书目》数据库,就是极好的事例,藉此可以让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源为学界所共享。与此同时,当我们在启

动《浙东学派编年史》这一大型学术工程之时,也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同步启动“浙东学派研究特色数据库”建设,以期收到惠己利人之效。

三、《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学脉梳理

编纂《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对浙东学派的学脉梳理与贯通。对此,前人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浙东学派的渊源追溯与阶段划分。比如何炳松在著于1932年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首次将浙东学派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自南宋至明初,第二期自明末到现在。第一期有永嘉、金华两大派,并由金华分出四明的一支;第二期中兴于绍兴,而分为宁波与绍兴的两派。”而目前学界有关浙东学派发展阶段的划分,当首推张刚雁提出的“四阶段”之说:(1)北宋。以“明州杨杜五子”与“永嘉九先生”为主要代表,是为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2)南宋。已经形成浙东诸学派,主要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及传授陆九渊心学、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3)明代。以阳明心学的兴起为主要内容,其后又有“浙中王门”和蕺山学派;(4)清代。主要代表有一代大儒黄宗羲、明史专家万斯同、文献学大师全祖望、史论大家章学诚、史学专家邵晋涵等,是为浙东学术的全盛时期。^[2]另一重要工作是对浙东学派学术精神传承的探讨与总结。台湾学者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归纳为:博约之精神;躬行精神;经世精神;民族思想之寓于史学;求其会同,持平其间。^[3]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归纳为: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4]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归纳为: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5]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归纳为:平彰学术,考镜源流;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应实相生,崇尚性情;严于去伪,慎于治偏;砥砺气节,躬行实践。^[6]此外,也有不少学者重在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派学术精神的探讨与总结。如王凤贤《试评乾嘉以来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归纳为: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启蒙色彩;擅长史学的特色;“经世致用”的精神。^[7]徐吉军《论清代浙东学派的治学特征》归纳为:苦学博览,严于考订的治学方法;勇于创发,注重求真的

治学精神; 坚守所学, 兼取诸家之长的态度; 经世致用, 反对空谈心性的学风; 富有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8] 陈祖武《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归纳为: 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 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 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9] 冯俊《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归纳为: 实事求是和反对空谈的精神; 以民为本和政治革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和注重事功的精神; 立足现实和史学经世的精神。^[10]

以上两方面的工作, 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 也充分展示了相应的学术深度。但从建构一个富创意的集成性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高远目标以及需要史识与文献双重支撑的更高要求衡量, 令人所憾的是, 这些学术归纳与结论普遍未能建立在更为扎实的编年基础之上, 也未能进而以史识融会于编年之中而熔铸为集成性的编年史之作。刘志琴曾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总序《清史有待垦天荒》中提出“借助编年, 走进历史场景”的学术理念, 颇有启示意义。她说: 时间是历史的灵魂, 历史是时间的科学。在史学著作中突出时间意识, 无疑是以编年体为首选的体裁。考其源流, 详其始末, 按其问题的起点、高峰或终点, 分别列入相应的年度。按年查索, 同一问题在此年和彼年反复出现, 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而有不同的风貌。这在连年动荡、风云迭起的时代, 便于真切地把握年年不同的社会景象, 清晰地再现事态发展的本来面目。编年体具有明显的时序性、精确性和无所不包的容量。^[11] 同样, 借助学术编年, 也可以让人们走进学术史的历史场景, 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当然, 更准确地说, 历史场景, 首先是时间维度, 同时也是空间维度, 是特定时空的两相交融。学术史, 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 才有可能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 学术史就如一条曲折向前不断越过峡谷与平原、最终流向大海的河流, 从发源开始, 何时汇为主流, 何时分为支流, 何时越过峡谷, 何时流经平原, 何时波涛汹涌, 何时风平浪静, 以及河流周边的环境生态, 等等, 都有特定的时间。一部学术史如何让其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即取决于能否以及如何走进时空合一的历史场景, 这也是能否以及如何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学术史

的历史还原与重建的关键所在。

鉴于浙东学派学脉传承的漫长、多元、曲折、复杂, 真正要做到梳而理之, 贯为通之, 的确并非一件易事。《浙东学派编年史》体例与功能的优良之处, 即在于能最大限度帮助我们走进时空合一的“历史场景”, 并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浙东学派学脉传承的历史还原与重建。台湾学者陈训慈谓“清代浙东之学, 近承姚江性命之教, 而远绍两宋儒哲之传, 两宋三百年之间, 大儒蔚起, 浙东学者与中原相望, 而永嘉、金华、宁波三处之学风为尤盛”。^[3] 这是由清代浙东学派通过“近承”上溯于明代的王学, 又通过“远绍”上溯于宋代的永嘉、金华、宁波之学, 但究竟是如何“近承”? 又如何“远绍”? 比较而言, “远绍”的学脉梳理和贯通当比“近承”更难。杨太辛则由源观流, 谓“自南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 名家辈出, 各有所得。细按之, 分源别派, 或以地望名, 如金华、永康、水嘉、会稽、四明; 或以师承称, 如吕学、王学。概言之, 曰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是否可概称为浙东学派, 赞成者言之凿凿, 反对者诤诤有词, 这些且按下不表。但由于地域、师承、学风、时代的综合影响, 浙东学术, 无论其为金华、永嘉, 还是会稽、四明, 不管其宗程朱, 还是宗陆王, 大致有一种共同的精神, 故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6] 所谓“浙东学术精神”, 的确广泛涉及地域、时代、师承、学风等诸多问题, 如何由现象回归本原, 由偶然走向必然? 在此, 深刻的史识与坚实的文献同等重要, 前者通过后者印证才更加可靠, 而后者则可以引发前者的深化与飞跃。编年史之不同于一般的编年, 更不同于个体的学者年谱, 即在于它旨在寻求两者的密切互动与交融, 最终臻于历时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就《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学脉梳理与贯通而言, 则需要在史识与文献的互动交融过程中, 重点关注和解决直接关系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是内蕴与外化的问题, 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渊源的本土孕育与外来涵化的关系。南北宋之交, 浙东以及整个江南经历了从文化边缘到文化中心的重大变化, 浙东学派在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异趋的双重选择中, 由其固有的“边缘活力”逐步累积而成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勇于怀疑、善于创新、追求独立与卓越的本土文化

精神,并在“边缘—中心”的重大跨越与前行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以此深厚内蕴广泛吸纳外来文化,最终往往通过反涵外来文化一同建构并内化为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主流与多元的问题,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结构的主流引领与多元共存的关系。浙东学派对儒道佛三教合一以及儒家内圣与外王的选择,往往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但始终一以贯之的是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在此主导下,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结构的多元共存,同时呈现于浙东区域的本土亚文化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这种主导性与多元性和谐共存局面的形成与延续,与浙东学派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互为因果的;三是传统与新变的问题,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演进的历史承继与因时变革的关系。古人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12]浙东学派之所以拥有如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即在于该学派既以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为主导,同时又能直面不同的时代课题,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上引学者所作的概括——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导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等等,都是对浙东学派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精神的精辟提炼和阐发;四是近承与远绍的问题,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传承的直接师承与学统认同的关系。学术谱系的传承首先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直接师承而依次向前延续,这是一种“实在”的传承关系,通常容易把握。对浙东学派而言,除了应该充分关注这一“近承”关系之外,还有“远绍”的问题,这是一种超越直接师承关系、出于同代甚至不同时代之间的学统认同,是一种“虚拟”的传承关系,需要细加辨析。只有近承与远绍相互并观,才能从虚、实两个方面完整而又辩证地把握浙东学派的学脉传承;五是原典与播迁的问题,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资源的原创动力与播迁效能的关系。原典是指作为学术文化源头的经典要籍、思想、精神等,是一种未经修饰、诠释、解读的最本源的经典与学说。但对某一学派而言,原典与经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宋到清,浙东学派不仅一直保持着不断催生学术经典的强劲动力和活力,而且许多经典要籍也在历

经风雨沧桑洗礼之后而转化和升华为原典之作。其在不同时空中的播迁效能——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持续影响力,反过来也是对发自谱系本原的原典与经典生命力的综合检验。以上五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编年史》对浙东学派的学脉梳理与贯通以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与完善。

四、《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编纂体例

编年体史书源远流长,导源于《春秋》由《资治通鉴》集其大成,这是编年体学术史的主体渊源。另一个重要源头是产生于宋代文人年谱,与宋代以后文人学者化的普遍趋势相契合,文人年谱中学术方面内容的比重日益加重,显示了年谱由“文”而“学”的重心转移倾向。而从个体学术年谱到群体性的学术编年,以及一代乃至通代的学术编年,实为前者的不断放大而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超越个体的编年体学术史著作晚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花结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与《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在著述体例上,两书主要以编年体史书代表作《资治通鉴》为参照,同时吸取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加以融会贯通,标志着学术编年体走向了成熟。此后,各种学术编年著作陆续问世,在著述体例上也得到了不断完善。比如陈祖武、朱彤窗所著《乾嘉学术编年》之于原始史料的重视与学术思想流变考辨的有机结合,张岂之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之于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的多方位展现,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学术编年》之于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与学者生卒四大板块的重新设置以及以“按语”凸显学术史的内涵,等等,都在原有编年体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对《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编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建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更高定位,《浙东学派编年史》应是一部贯通宋元明清浙东学派发展历程、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该派学脉传承的学术专著。因此,不仅需要集合现有编年体著作的优点,而且要进一步臻于深刻的史识与坚实的文献密切互动与交融,真正成为“编年”之“史”与“史”之“编年”。根据我们的初步构想,《编年史》拟分宋元、明代、清代上中下三卷,每卷先有“总论”,以揭示该时段浙东学派的发展走向和主要成就,然

后以时间为线索,采用“条目”、“按语”与“评述”三位一体的独特体例,逐年著录学术发展史内容;“条目”部分,分学术背景、学术活动与学者生卒三大板块著录;“按语”部分,是对“条目”内容的总结与提示,视必要加诸相关“条目”之下,主要包括文献存真、补充说明、原委概述、异说考辨、新见论证、价值评判等;“评述”部分,殿于每年之尾,是对该年学术传承的主流学脉与新变趋势的总体评述,以重点关注以下四大规律凸显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学术追求:一是重点关注浙东学派的宏观发展演变历程,以见学术传承与创新规律;二是重点关注浙东学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体历程,以见学术流派的兴替规律;三是重点关注浙东学派群体的区域流向、移位、承变历程,以见学术中心的迁移规律;四是重点关注浙东学派内外学术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历程,以见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学术传通规律。如果说“条目”部分重点在体现“编年史”之“编年”的功能,那么“按语”与“评述”部分则重点在体现和强化“编年史”之“史”的功能,后者犹如揭示各代学术发展的“纲目”,若将各卷“按语”与“评述”组合起来,即相当于一部简明学术史。

《浙东学派编年史》是一项力图突破现状、开辟新径的重大研究工程。可以想见,当我们一旦进入具体的研究实践之后,既会不时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问题,也会不时收获各种意想不

到的发现和感悟。鉴于此,需要对《编年史》原有的学术创意和构想不断加以调适和完善,努力使之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集前人之大成的学术精品之作,真正臻于“编年”之“史”与以“史”“编年”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林存阳.浙东学派研究述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9-32.
- [2]张刚雁.浙东学派概述[J].资料通讯,2001(11):28-30.
- [3]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C]/杜维运,黄进兴.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579-599.
- [4]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J].浙江学刊,1994(1):50-55.
- [5]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3-7.
- [6]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J].浙江社会科学,1996(1):90-95.
- [7]王凤贤.试评乾嘉以来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J].浙江学刊,1987(1):25-35.
- [8]徐吉军.论清代浙东学派的治学特征[J].史学史研究,1987(3):58-63.
- [9]陈祖武.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N].光明日报,2004-03-02.
- [10]冯俊.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在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文化研讨会上的致辞[J].宁波党校学报,2005(6):8-9.
- [11]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7-31.
- [12]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7.

Academic Creativity and Ideas of Chronicles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MEIXi-lin, YU Zhang-hua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utheast-China Cul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is an academic school which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a's academic history. Although the current study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the absence of the research in its chronicle has become a major bottleneck for its further research. Compiled on a solid basis of documents, *Chronicles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has not only constructed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from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study of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and closely related general history and regional academic history in a new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Meanwhile, it also supplies rich resources of academic though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chronicle; academic ideas

(责任编辑 吴波)